



華夏英才基金學術文庫

CHINA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中国：阻击腐败

邵道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華夏英才基金圖書文庫

中国：阻击腐败

CHINA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邵道生◎著



社会科 学文 献出 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阻击腐败/邵道生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097 - 1205 - 4

I . ①中… II . ①邵… III . ①廉政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 ①D6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465 号

中国：阻击腐败

著 者 / 邵道生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责任校对 / 谢 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9.75
字 数 / 53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205 - 4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兹将本书——

献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汪佩兰教授，没有她“精心”、“悉心”、“恒心”的照料，也就不会有我这个白血病人的今天，也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的确就是这样，20年的白血病，20年的“磨”一书，20年一双子女的上进成才，以夫人为“主心骨”的作用，实在是至关重要啊！

当然，本书之所以能顺利问世，没有华夏英才基金会的严格审查和慷慨资助，没有社会学所新领导的诚挚支持和鼎力相助，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在此深表谢意。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页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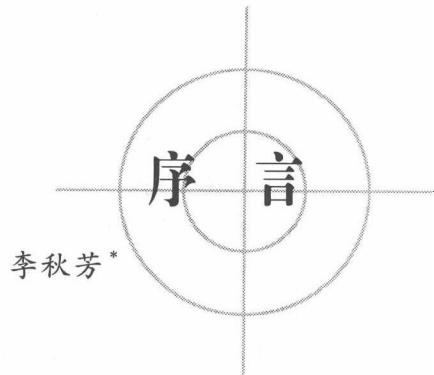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14页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江泽民：1993年8月21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

——胡锦涛：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先生的著作《中国：阻击腐败》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邵道生先生是无党派人士。曾记得，我刚被中央纪委派驻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时，就多次听中央纪委领导和身边纪检干部介绍作为社科院寥寥可数的廉政研究专家邵道生其人其事。二十多年来，邵先生甘入廉政建设之热门、廉政研究之“冷门”，全身心地投入腐败与反腐败研究，退休后仍视该领域研究为“第二次学术青春”，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笔耕不辍，发表了数百篇、二百余万字的廉政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好文章。虽然我们尚未谋面，但当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转达邵先生希望我为他“二十年磨一剑”的这本书作序的愿望时，我深深为他持之以恒热心廉政研究的精神所感动，欣然应下。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廉政研究事业起步较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才偏少，有益于反腐倡廉决策和实践的成果也有限。近年来，随着中央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加紧构建，应着反腐倡廉建设决策和实践的需求，全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到廉政研究事业中来。在这个呼唤廉政研究事业发展、激励廉政研究人才成长的大潮中，中国社科院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专家学者云集的优势，开启了有组织、有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研究的大门，每年有百名之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反腐倡廉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和国情调研中来，产出了许多质量好、有价值的成果，既为反腐倡廉建设决策和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也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学科建设，促进了人才成长。包括邵先生在内的专家学者对廉政研究事业的参与态势表明，此乃反腐倡廉事业兴旺之幸事、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之幸事。邵先生

* 李秋芳同志是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



作为中国社科院较早从事廉政研究、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多年来凭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不懈地致力于复杂而艰难的腐败与反腐败研究，并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我为廉政研究事业得到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支持感到由衷的欣慰。

邵道生先生一直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用自己的眼光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在学术上，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照搬外国理论和模式。在《中国：阻击腐败》一书中，他根据对腐败和反腐败信息的长期积累，对我国存在的突出腐败现象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剖析，大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和意见。从中可以触摸到的是，邵先生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事业的满腔热忱、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作为专家学者的观点和主张，不可能都得到广泛共识，也不会都被反腐倡廉决策和实践所采用，只要不乏启迪和参考作用，就应视为具有价值。阅其书，可观其人。我了解到，邵道生先生为人坦诚直率，语言犀利，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是火辣辣的，批判味很浓，甚至一点情面都不讲”。他真诚地欢迎大家对其书中的学术观点予以批评和争鸣，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学术心态，这种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是应当提倡的。

当前，一些地方和领域仍处于腐败易发高发期，我国反腐败斗争仍处于文化与制度博弈期。随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凸显，腐败形式正呈现出新的变化：腐败主体从个体向群体蔓延，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非法所得从短期化向长期化、期权化演变，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领域浸染到文化社会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出现了跨国腐败。腐败现象的扩展蔓延，大多发生在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协调之时，最易发生在优势资源集中、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部门、行业和职位。为有效治理腐败，我国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着力加强廉洁自律教育，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充满着期待。反腐败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加紧构建，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腐败问题终将得到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空间必将越来越小，这是不可改变的总趋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信心、勇气和有效措施，当然也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像邵道生先生这样真诚参与、务实研究和倾力支持廉政研究事业。

2009年10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 高利益诱惑下的腐败泛滥 / 1

- 第一节 社会变革剧烈阶段与严峻的腐败态势 / 1
- 第二节 官员腐败蜕变的始因：无度的欲望 / 7
- 第三节 官员腐败蜕变的主因：信仰危机 / 13
- 第四节 腐败蜕变官员之人格 / 18
- 第五节 腐败分子不怕亡党亡国 / 26

第二章 ◦ 危害最大、最烈的吏治腐败 / 32

- 第一节 “治国就是治吏” / 32
- 第二节 贪官发迹之谜（一）：“有能耐”但又“靠不住” / 35
- 第三节 贪官发迹之谜（二）：善于包装、精于作秀 / 39
- 第四节 贪官发迹之谜（三）：强大的“关系网” / 47
- 第五节 贪官发迹之谜（四）：火爆的“官市” / 54
- 第六节 怎样治理吏治腐败 / 64

第三章 ◦ 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 / 77

- 第一节 社会转型期“第一把手”腐败现象的确很严重 / 77
- 第二节 “第一把手”腐败与腐败泛滥高峰期 / 84
- 第三节 “绝对权力”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的腐败高峰 / 88



第四节 “家长制”复活导致“第一把手”的 “绝对权力” / 94
第五节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一）：继续严查 “高级干部”的腐败 / 100
第六节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二）：认真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105
第七节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三）：加强舆论监督 / 113
第八节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四）：大力弘扬 官场正气 / 122
第九节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五）：强化领导的 民主作风 / 129
第十节 “第一把手”怎样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 / 137
第四章 ◦ 权力异化下的“权力资本腐败” / 146
第一节 “权力资本腐败” / 146
第二节 “权力资本腐败”与“问题富豪” / 155
第三节 “地产腐败”与“权力资本腐败” / 167
第四节 “国企改制”与“权力资本腐败” / 175
第五节 “权力资本腐败”与“红顶商人化”、 “商人红顶化” / 186
第五章 ◦ “既得利益集团”与当今中国的腐败 / 198
第一节 “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与 “特殊利益集团” / 198
第二节 “既得利益集团”与“局部性和平演变” / 209
第三节 “既得利益集团”与地方腐败势力 / 217
第四节 “腐败利益集团”是改革健康发展的大敌 / 225

第六章 ◦ 极度损害民生利益的“小腐败” / 236

- 第一节 “大腐败”和“小腐败” / 236
- 第二节 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和“不满意” / 242
- 第三节 形形色色、无处不在的“小腐败” / 247
- 第四节 “小腐败”与“信访洪峰年” / 261
- 第五节 有些“小腐败”实际上已经不小了（一）：损害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 / 268
- 第六节 有些“小腐败”实际上已经不小了（二）：让数千万“4050代”工人下岗的“国企改制” / 274
- 第七节 有些“小腐败”实际上已经不小了（三）：要命的“癌症村” / 278

第七章 ◦ “色情腐败”与“色情贿赂” / 287

- 第一节 一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与“色情腐败” / 287
- 第二节 “权色交易”下的“色情腐败” / 292
- 第三节 当今社会“色情腐败”的特点 / 296
- 第四节 当今贪官为何多好色 / 303
- 第五节 贪官好色的危害 / 308
- 第六节 “色情腐败”的治理 / 313

第八章 ◦ 带有封建印记的“权力家族腐败” / 322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 / 322
- 第二节 “家族腐败”与腐败官员的“曲线腐败” / 325
- 第三节 “权力家族腐败”的特点 / 330
- 第四节 “贪官裸奔”与“跨国家庭” / 337
- 第五节 “权力家族腐败”与家庭财产申报制度 / 344



第九章 ◦ 腐败势力与“黑恶势力”的“联姻” / 354

- 第一节 恶势力：社会的另一种存在 / 354
- 第二节 权力腐败与腐败恶势力 / 367
- 第三节 社会转型期黑恶势力的发展 / 380
- 第四节 腐败势力与“黑恶势力”的“联姻” / 391
- 第五节 解决腐败势力与“黑恶势力”“联姻”的对策 / 401

第十章 ◦ 十六大以来的反腐败 / 408

- 第一节 反腐败指导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 408
- 第二节 “刮骨疗毒”：腐败分子开始进入受审高峰期 / 421
- 第三节 在强化中央权威中反腐败 / 432
- 第四节 “小腐败”成为反腐败的一个重点 / 441
- 第五节 “新三论”是十六大以来反腐败健康发展的基石 / 449

后记 ◦ 我为什么研究反腐败 / 461

第一章

高利益诱惑下的腐败泛滥

第一节 社会变革剧烈阶段与严峻的腐败态势

一 什么是腐败

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表明，因腐败而导致“人亡政息”，导致政权的垮台、灭亡，肯定是一个规律。因为对一个政权来说，腐败是一种无形但又能量极大的内蚀力、破坏力；因为当一个统治集团内腐败泛滥、过于强大、无法抑制时，就会使整个统治机器腐败、衰落、变朽，其结果就是政权的灭亡；因为腐败是祸国殃民的，人民是腐败最大、最终的受害者，腐败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的暴动、起义等多种形式的反抗。

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权中单个官吏的腐败并不可怕，不管他位高权重到何种程度，都会被统治集团内的“健康力量”清除、消灭掉。然而一旦形成“群发性官吏腐败”或“集群性官吏腐败”，其腐败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产生危及政权的“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和强大的腐败势力，这时的政权内部，就会缺乏制约腐败发展的“健康力量”，最后只能导致政权的垮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像美国政治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一个政权，一种已经确立了的制度，极少是被革命运动所推翻的；它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的虚弱和腐败而倒塌的，革命运动随之在这片废墟上兴起，接管了已经成为真实的权力。”^①

正因为腐败对执政集团有着强大的杀伤力，所以腐败问题就成为一个很

^① 转引自伍天冀、杜红卫编译《政治的智慧》，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第122页。



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什么是腐败呢？政界、学界争论得很厉害，但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观点，不同组织、不同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什么是腐败作出了定义。

世界银行认为：“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对公共职位的滥用。”世界银行反腐败行动计划工作组在《帮助各国同腐败作斗争：世界银行的作用》这一研究报告中对腐败作了上述的定义，并接着解释说：“当官员接受或索取贿赂时，公共职位因私人利益而被滥用；当私营机构主动提供贿赂以影响公共政策及其决策过程以获取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和利益时，公共职位也是被滥用。”

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

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①

约瑟夫·尼尔认为：“腐败是为私人、家庭成员或私人小圈子获取金钱、身份而背离公共角色的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违反那些旨在防止滥用私人影响以谋取私利的规则的行为。腐败包括贿赂（以物质腐蚀某一职位占有者以影响他的判断）、裙带关系（基于私人关系而不是按照人的品德提供庇护）和盗用（为个人目的非法盗用或侵占公共资源）。”^②

迈克尔·约翰逊采用广义的腐败定义，认为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③。这一定义更接近于政治腐败的含义。

卡尔·弗里德里希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定义腐败：“当主管某些事务的权力掌握者、责任重大的官员或行政职位占有者，为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所引诱，采取偏袒这些金钱、报酬的提供者的行动，因而确实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者，即为腐败。”^④

纳塞尼尔·莱夫以经济学的方法和模型给腐败下定义：“腐败是某些个

①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54页。

② 转引自风政《论“腐败”的定义》，《新视野》2003年第5期。

③ 转引自风政《论“腐败”的定义》，《新视野》2003年第5期。

④ 转引自风政《论“腐败”的定义》，《新视野》2003年第5期。

人或集团为影响官僚的行动而使用的一种法外制度。腐败的这一本质仅仅表明，这些集团较之其他情况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了决策过程。”^①

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②。

于风政认为中国腐败的定义要考虑很多特殊存在，他关于腐败的定义是中国化的：“腐败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与他人合谋，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谋取私利或为某一单位、某一行业谋取特殊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个人利益的行为。”^③

而我则认为，腐败就是利用公权公职，采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属的小集团谋取私利的现象，简言之，“腐败就是用公权谋取私利”。

二 转型期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

转型期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会泛滥成灾？为什么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发出了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警告？这些既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也为当今学界所热烈探讨。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65 美元至 1075 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与此相应的是，“拉美化”现象亦表明：当拉美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之后，便陷于长期的社会动荡、程序混乱、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利益冲突激烈，腐败亦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行病。

经历剧变之后的俄罗斯，“有关资料显示，其官员每年中饱私囊的钱财几乎等于俄罗斯全年的财政收入。而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调查显示，自 2001 年以来，俄罗斯贪污受贿案增加了 7 倍。在该组织出台的 2006 年 163 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俄罗斯列第 127 位。而尤为令人警醒的是，腐败问题已经导致恐怖主义在俄罗斯的扩张。”^④

^① 转引自于风政《论“腐败”的定义》，《新视野》2003年第5期。

^② 刘峰岩、黄炎智主编《古今中外反腐倡廉要览》，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第 372 页。

^③ 于风政：《论“腐败”的定义》，《新视野》2003年第5期。

^④ 中国廉政文化网，2007-02-08。



长期调查腐败问题的国际专家更是指出，腐败就像最常见的流行病感冒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对其完全免疫。这种发生于“政府的腐败”，每年都要使全世界损失大约6000亿美元的资金^①。

当然，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特别复杂，光搬国外的腐败理论，也许有点“新意”，如那个所谓的“权力寻租论”，不过依我之见，它除了用人们不懂的或复杂的文字去代替谁都明白的“权钱交易”这四个字之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探究转型期中国腐败的原因，只能从中国权力腐败者的“腐败实践”中寻找。

那么，转型期中国社会腐败泛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腐败了的权力者禁不住“巨大利益的诱惑”，这是腐败发展、泛滥的主要原因，也是内因。这是为什么？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

第一，这是因为人们被过去的“贫穷日子”给穷怕了，在新的历史性致富机遇面前，谁都想迅速“脱贫致富”，而且还“一窝蜂式”的。一般来说，凡一个社会只为“一个致富热点”所驱动，而且都涌向一座致富“独木桥”时，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或是“独木桥”上的人群因过于拥挤而纷纷落水，或是因为这座“独木桥”承受不了拥挤人群的“重量”而断裂，于是出现众多人落水丧命的现象。

第二，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非常大。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落后的和先进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进步的和反动的，什么观点、看法都有，什么都会出现。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出现断裂从而丧失了往昔的主导性，社会控制很是混乱、“虚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会在一部分人身上毫无阻碍地滋长，社会因缺乏强有力的整合而变得虚弱进而失控、失衡，往往“把握”不住，因而这一历史时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第三，社会转型期的“利益诱惑”是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利益诱惑”的机会也特别多，尤其是在权力制约失控、权力监督乏力的情况下，“利益的诱惑”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些当权者会利用权力的优势以改革的名义将利益向自己倾斜，“有钱人”与“有权人”会在共同利益的吸引下结成“利益同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强大“利益诱惑”的冲击下，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的权力者和现行的

^① 巫继学：《“4万亿腐败”狙击战》，光明网，2008-12-26。

制度，会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因而很容易出问题。

第四，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尚未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各种“游戏规则”。原因有三：一是历史的局限性使整个社会无法也不可能迅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各种“游戏规则”；二是“特殊的权力制度”很容易产生“权力本位”、“权力优先”现象；三是鉴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思想解放有限，当时要进行探索建立各种“游戏规则”的理论讨论非常困难，大家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坦率地讲，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反腐实践之探索是困难的，亦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总之，就像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对权力腐败形成的经济犯罪这股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还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

三 转型社会对利益的诱惑提出了三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除了改革别无他路可走。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利用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什么是改革？从本质上说，改革就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革开放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1978年，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而2007年上升至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GDP从占世界的1.8%升至6%。综合国力由弱变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迅速增加。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79~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1%。其中，1978年国家财政收

入仅为 1132 亿元，1985 年翻了一番，1993 年再翻一番，1999 年跨上 1 万亿元台阶，2003 年超过 2 万亿元，2007 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 51322 亿元。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对外经济大开放，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2007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比 1978 年增长 104.3 倍，居世界位次由第 29 位跃升至第 3 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 0.8% 提高到 7.7%。总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引发的社会变化是剧烈的，改革对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思想、行为方式、人们的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改革过程中引发的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更是超乎人们想象。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就像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旋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尽管这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们心态的一段写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巨变过程中中国国民的心态变化。的确是这样，当成千上万被疯狂的、无限膨胀的“逐利动机”所驱赶的人们，全都挤向致富“独木桥”，而且都还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怎能不出问题？

在社会巨变的转型期，社会资源出现大规模的变动，其利益诱惑是巨大的，这就给腐败提供了土壤和空间。面对这巨大的利益诱惑，社会提出了三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怎样获得利益？”“谁能首先获得利益？”“按照什么游戏规则获得利益？”于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难以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和少数权力者就以腐败的方式来“回答”、“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第一，一些富有资本积累经验的国外或境外的大商人、大跨国公司，为了迅速获取利益、迅速占领巨大的中国市场，与“有权人”进行了权钱交易，建立起利益上的共同体。为什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获得政治权力机会较少的社会中，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换取后者。”^① 相关资料表明，近十年的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行贿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

^①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 66 页。